

# 人性的A面和B面

30年前,台湾学者蒋勳在旧金山机场第一次见到丁玲,“头发全白,满脸皱纹,像农村老太太,穿着布衣布鞋,茫然地站在那里。”后来蒋勳和丁玲去芝加哥最高的楼顶,一屋子貂皮女,抽烟,时髦而颓废,丁玲很平静地用肘子捅蒋勳:“当年我在上海就是这样。”

人是会变脸的。丁玲24岁就写性解放,甚至写“女同”,旖旎情史也不少,后来时而右倾,时而左倾,新潮过,革命过,张扬过,跟风过,老来终于想通透了,跟她的宿敌周扬一样。

许多年里,我只知道赫鲁晓夫是一个在联大会议上用皮鞋敲桌子的莽夫,后来知道了他在斯大林死后3年便挫骨扬灰,揭露出无数血腥往事,而此前20年,他又曾是斯大林路线的鼓吹者和执行者,单是在一份文件里就圈定了8500个死刑名单。至于著名酷吏贝利亚,固然满手鲜血,但却是斯大林死后破除个人崇拜、实施平反运动的第一人,他推行的改革措施甚至比赫鲁晓夫更早更激进。在不同的时光里,老虎是可以念佛的,而念佛的可以杀人。

所谓屁股决定脑袋,大抵没错。当年我

## 新锐短评

### 让尊严免于“被冻伤”

11月30日中午,一农民工在郑州郑汴路立交桥下躺了20多天后离世。周围民众称,他是病死或被冻死。在此期间,120和救助站被曝见而未救。这起悲剧,因多重凄冷元素的叠加,而刺痛人心。也许它只是个案,可一个民工的非正常死亡,是解剖底层群体生存、社会救济等的微观切口。体面而有尊严地活着,生命之花才不至于凋零。而死于病患或饥寒,却在剥落“尊严”的内核。也只有延伸关怀触角,从长效保障、临时救济等多维度去完善,才能让每份尊严都柔软舒展,免于“被冻伤”的厄运。

(摘自《长江商报》12.3 余宗明/文)

### 有多少猕猴被“公务消费”

央视记者日前在江西省资溪县采访时发现,有三名盗猎者在国有林场猎杀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猕猴,林区管理人员竟无人出面阻止。当地一些餐馆、酒楼,也偷偷宰杀和出售猕猴。一家叫“珍珠农家乐”的餐厅挂着抚州市公务消费定点商家的牌子,据介绍,这个牌子是当地三公消费办公室颁发的。类似的消费野生动物,在很多地方其实早已存在,并成为官场上尽人皆知的秘密。有多少猕猴成为公务消费的盘中餐?只要这类消费行为存在,则杀害将不绝如缕。而治理消费,首要的就是约束公权力,不使公务消费猕猴等野生动物的行为再度发生。

(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11.29 胡印斌/文)

### “陈冠希广告”不能只为“眼球”

近日,上海地铁里出现一则“艳照门”主角陈冠希代言的某租车公司五年庆的广告,“寻开心,0开销”这种暗示性的广告语让不少乘客“难以接受”。“艳照门”主角陈冠希名声不佳,可是有些商家却剑走偏锋,让这样的问题艺人做代言。而广告的制作和设计者无疑是始作俑者,他们把低俗当卖点恶炒。陈冠希的地铁广告是撤了,可是监管部门“滞后”,说明相关部门只有管理而没有之前的监督。因此,应该进一步强化广告审查,同时对于违规投放的广告制作商予以严厉惩罚,别让公众受到一些“无良”广告时不时的骚扰。(摘自《新京报》12.3 马龙华/文)

听某同事聊起其大学师兄,在校时温润可人,热情和善,后来一头扎入官场,遂成跋扈小吏,变化之快令人侧目。此人曾眼光凌厉地对我说:汝可知是脖子硬还是刀硬?

据说年少时激进的,老来必保守顽固,康有为和李敖都是例证。我年轻时顽劣散漫,人到中年却变得枯燥严谨,似乎也正在印证这一定律。将来我努力紧跟时代潮流,不让自己变得那么面目可憎。

最近在微博上看到许知远的一句话,大意是某些曾经傲骨的文人忽然趋炎附势起来,其实一点都不惊奇。人性里边永远有A面和B面,或因时间更改,或因境遇更改,或因某一时的春风秋雨触动而更改,总不是固定的。《无间道》导演麦兆辉说,他幼时住警察大院,踢皮球时吵醒了出更的夜班警察,警察黑着脸提着菜刀走来,抢走了皮球,3分钟后又把皮球捧回来,可那球已经碎尸成两半。

我们在这世间,脸在变,身在变,心在变。变节不需要理由。段祺瑞下野后,在天津吃素寓公,整天眯着眼捻佛珠敲木鱼,眼看着舍利子都要长出来了,忽然孙中山邀他一起倒直,他立马丢掉佛珠重返政坛。

(摘自《春城晚报》刘原/文)

1992年3月,波兰克拉科夫市政府作出规划,在市区内建设五栋标志性建筑——五环广场,呈奥运会五环形排列,以此作为该市体育运动场所,其中有一栋楼,正好规划在一片绿地上,那片绿地上长着青草、小树,市民经常到那里去休闲,但根据规划,这片绿地即将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五层高的楼房。

1992年4月3日,市政工程的一辆铲车开到这块绿地前,准备将绿地夷为平地。市民发现了这辆铲车,便把它围了起来,不让铲车开进绿地,很多人还手拉手组成围墙,将绿地围住。市长派出几名官员前往现场,与市民对话,说建设体育广场也是为市民健身运动着想,劝说市民自行离开,为工程让路。但市民提出:“既然是为我们着想,为什么事先不征求我们的意见?”官员强调,此项工程是由市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的,具有法律效力。但市民们反驳说:“法律也得在民意的基础上执行,如果违背了民意,就自动失效!”

市长最终决定将问题交给法院处理。第二天,在法庭上,市政部门强调此规划是为了市民的利益着想,所以没有违背民意,因而具有法律效力。但市民代表认为,既然市民不同意,就说明规划已经违背了民意,而违背了民意的规划当然不再具有法律效力。法庭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,最后做出裁判:“规划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,不能根据是不是为市民的利益着想来判断,只要违背了民意,当然就是无效的。”因此裁定市政部门停止施工,要求市政府撤销所做的规划。

于是,规划中的五环广场变成了四环广场,四环广场前面,就是一片开阔的绿地,20年过去了,当年的小树都已经长成了参天的大树,夏季到来的时候,人们会在树下休闲、纳凉,绿地被市政府命名为“民主绿地”。在绿地的中央位置,市政府立了一块碑,碑文上写着这样几行字:“向保护绿地的勇敢市民致敬,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彰显了民主体量的伟大,民意是最高法律。”

(摘自《中国劳动保障报》唐宝民/文)

## “卖官”的境界



从“政治经济学”角度看,“卖官”是有境界之分的。今日“卖官书记”们的做法,公器私卖,可视为黑道私企的黑市交易;而古人的“捐纳”则无疑属于国营大厂的公开拍卖。这是最为人人知的两种“卖”法了。

客观地说,倘若官职横竖都是卖,那么公开卖无疑是交易成本最低、交易风险最小的一种方式。比起黑市交易,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,好处多多——卖方可以免除被绳之以法的恐惧;买方不必绞尽脑汁揣测行情,不必担心“暗标”失败血本无归;其他人也可不必继续“默默奉献等提拔”,只需抬头瞄一眼价格表,再摸摸腰包便可明白,是举牌竞标,还是低头认命;即使皇帝,也有好处,至少卖官收入不至于完全被各级官员私吞了去。

除了上述两种现金交易,实践中还有另一种广受赞誉的“官职买卖法”,不妨称之为全民共营、期货交易——每一项乌纱帽都由辖区内全体民众共同“拍卖”,竞拍者除了不能直接用现金之外,许多东西都可

(摘自《杂文月刊》2012年12月上 林永芳/文)

## 当年轻人成为“笼中鸟”

前几天参加一个80后、90后年轻人的文化心理的讲座,这让我想到严复先生译著《天演论》里的一句名言: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。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诠释了什么是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:一只虎皮鹦鹉飞出笼子逃走了。能够重新获得自由本是件好事,但是十多天后,人们在森林里发现了它的尸体,在果实累累的林子中竟会有鸟饿死!用看林老人的话讲:“家被养的鸟儿,用不着找吃找喝,慢慢地会失去寻食的本领,一旦飞出笼子,难免饿死。”很不幸,中国式的教育,正在使用着这个“家养虎皮鹦鹉”的教化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来自父母、来自老师们的教化,无一不在向孩子们提示着“笼子”的存在。现在的80后、90后,几乎都听过“好好读书就行了,不要想太多,不要去管别的事!”这句家训。以高考指挥棒为中心的学校教育,更是把学生们训练成了只会背诵正确答案的考试机器。你不可以胡思乱想标新立异,否则就要被无情地淘汰。

如此十年下来,被“笼式教育”教化出的青年们,很自然地把“适者生存”理解成了对“笼中法则”的顺从,越是这种教育体系下的优秀者,就越是处处显示

## 最高法律是民意

最高法律是民意

(摘自《中国劳动保障报》唐宝民/文)

### 一首有代表性的山西民歌

“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,不洗那个交城它浇了文水;灰毛驴驮上山灰毛驴驮下,一辈子的也没驮过那好车马;交城的大山里没啦那好茶饭,只有莜面栲栳栳还有那山药蛋;狠心的爹来没主意的妈,怎把奴家打发在那山脊见。”这是一首流传在山西交城、文水一带的民歌,起源不晚于清代,悲凉旋律十分动人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山西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了其中前三节,使它成为山西民歌最有代表性的曲目之一。我上世纪60年代末到山西插队,就经常听到这首歌的传唱。

### 重新填词变颂歌

到了1976年10月6日,王、张、江、姚被捕,华国锋当选中共中央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。他家乡的这首歌很快被地方的文艺工作者重新填词,成了一首全国反复演唱的颂歌:“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,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。交城的大山里住过咱游击队,游击队里有咱的华政委,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,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。华主席为咱除四害,锦绣那个前程放光辉。”

习惯了陕北民歌改编成《东方红》的中国百姓,很快也接受了山西民歌改编的《交城山》。直到两年后,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:“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。他提议,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,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,少宣传个人。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,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。”这首歌的传播才逐步降温。后来华国锋退出领导岗位,《交城山》也回归了原来的民歌版。

(摘自《杂文月刊》2012年12月上 林永芳/文)

## 谢晋交友：拒绝小人 不求实用

我从旁观察,发觉谢晋交友,有两个原则。一是拒绝小人,二是不求实用。这就使他身边的热闹中有一种少有的干净。相比之下,有些同样著名的老艺术家永远也摆不出谢导这样的友情阵仗,不是他们缺少魅力,而是本来要来参加的人想到同时还有几双忽闪的眼睛也会到场,就借故推托了。

有时,好人也会利用小人,但谢晋不利用。

他对小人的办法,不是争吵,不是驱逐,而是在最早的时间冷落。他的冷落,是烟火烟消,完全不予互动。

一些早已不会被他选为演员和编剧的老朋友,永远是他的座上宾。他们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帮不上他的忙,感到不安。西哲有言:“友情的败坏,是从利用开始的。”谢晋的友情,从不败坏。

他一点也不势利。再高的官,在他眼中只是他的观众,与天下千万观众没有区别。但因为他们是官,他会特别严厉一点。

对于受到挫折的人,他特别关心,包括官员。有一年,我认识的一位官员因事入狱。我以前与这位官员倒也没什么交往,这时却安慰他几句。正好上海市监狱邀请我去给几千个犯人讲课,我就向监狱长提出要与那个人谈一次话。监狱长说,与那个人谈话是不被允许的。我就问能不能写个条子,监狱长说可以。我就在一张纸上写道:“平日大家都忙,没有时间把外语再推进一步,祝贺你有了这个机会。”写完,托监狱长交给那个人。

谢晋听我说了这个过程,笑咪咪地动了一会脑筋,然后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说:“有了!你能送条子,那么,我可以进步,送月饼!过几天就是中秋节,你告诉监狱长,我谢晋要为犯人讲一次课!”

就这样,他为了让那个官员在监狱里过一个个像样的中秋节,居然主动去向犯人讲了一次课。那个人狱的官员,其实与他也没什么关系。

四年以后,那个人刑满释放,第一个电话打给我,说他听了我的话,在里边学外语,现在带出来一部五十万字的翻译稿。然后,他说,急于要请谢晋导演吃饭。谢导的那次中秋节行动,实在把他感动了,使他的狱中生活,不再有一日沮丧。(摘自《2009年度华文最佳散文》余秋雨/文)

# 《交城山》的“改”与“不改”

### 纪登奎拒绝批准传唱

公众有所不知的是,在这期间,以改编民歌的方式颂扬华国锋,在中央高层有过不同的意见。今年,我采访过经济学家纪坡民先生,他回忆了父亲纪登奎的一些往事:

中央宣传口的工作,原来是姚文元分管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改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分管。因为纪登奎管宣传,给他送来一首歌,就是“交城的山交城的水,交城出了个华政委”那一首,词曲都有了,就等他批了。只要他一批示,中央乐团、歌舞团演奏,广播电台、电视台播出,就会在全国传开了。这首歌送来以后,纪登奎没有批。过了几天,汪东兴来了,批评他“宣传华主席不力”。可是,对这首歌,纪登奎还是没有批。又过了几天,电话通知,中央要找他谈话。纪登奎去了以后,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李先念、汪东兴都在,对他说的话很简单,只有几句:中央的分工,做一点调整,宣传口,原来姚文元管,现在登奎同志管,以后交给汪东兴管。几天以后,中央又找他谈话,还是调整分工,中央组织部,原来一直是纪登奎管的,也交给汪东兴了。这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一个月的事;其中,宣传口从接管到交出,纪登奎查过工作日志,一共27天。

在政治局会议上,纪登奎还发言表达过这样的意见:



啊?是个县大队的政委嘛,一共只有十八个兵。问题是,你华政委领导了十八个兵的时候,共产党的军队里,不说那些元帅、大将了,就是肖华、杨成武、陈锡联这些人,也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了,这样的人已经有一大群了呀,这些人可都还活着哪。我在军队里干过几年,和‘老总’们在一起‘混’过,和他们还比较熟悉。领导十八个兵,就那么唱,你让那些‘老总’们听了,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儿?这首歌,对华主席在军队里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好,我这是为他考虑嘛。”

(摘自《文史参考》第22期 丁东/文)

## “文革”笑话:审讯者常因失言成罪犯

在文化大革命期间,江青、谢富治等规定,审讯人员在审讯当中,审讯者与被审讯者都不得有一言一语一句一字,损伤到他们的那个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——“中央文革”的成员陈、康、江、王、关、戚等。否则,就要同样问罪。这个荒唐的规定,闹出了许多笑话。有的审讯人员,昨夜还在审讯别人,由于一句问话被他人认为不当,或者对被审讯者的所谓“攻击言论”疏于“立场强烈反击”,第二天就变成了“利用审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”的重大政治罪犯,其中有人因此而被关押好多年的。

正因为如此,有的人甚至不敢临审。特别是1976年天安门运动前后,他们捕了三百多人。那些青年是公开反对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们祸国殃民的罪行的。一到审讯时,被审讯者开口就是骂江、张、姚、王、康生之

(摘自《从“童怀周”到审江青》汪文风/著)

(作者为当年审理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)



的问题。当时我对理想职业的考虑是这样的:我希望找到一种职业,能够免去种种令我感到恐怖的人际关系,尤其是能免去政治学习。这种职业也许赚钱很少,但责任心不大。那是1981-1982年,我找不到这样的工作。我曾盼望去省政协做烧开水的勤杂工,但等来等去终于没能轮到我。

有一天,我在走投无路之际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:学缝纫。对,为什么我不能学呢?这是一门可以解决生活费用的手艺,只要有恒心,我不信我就学不会。退一点来说,就算我最终没能学会,也可以帮人补补衣服,锁锁三线边什么的,我看见有的妇女就是以此为生。

接着我又想到我的丈夫,他是一个优秀的木工,做木模家具是看图纸划线,做服装不也是同样道理吗?正好家中有台缝纫机,我马上动手拆旧衣服,拆完再缝上,反反复复地练习,在我的带动下,丈夫也开始钻研裁缝书。当时我在一个仓库搞维修工作,那是种“磨阳寿”的工作,没事干领导也不让回家。所以他白天干活晚上都在维修房关上门打瞌睡,晚上回来用报纸裁纸片。

对未来的憧憬激励着我;成为自食其力的小业主,万事不求人,不找关系,凭手艺过日子,与此同时获取搞艺术创作的条件。缝纫不仅是一门容易学的手艺,既需要韧性又需要灵性,我记得有多少个夜晚,我们为了攻克难关,一直工作到凌晨三、四点;还有一次因遇上难题,竟连3岁儿子吃饭的事都忘了,为此自责得夜间失眠:……其中的艰辛自不必细说。

流,审讯人员耳朵里灌满了骂他们的“首长”的言论。因此,当时的审讯室,除了被审讯者的痛苦,就是审讯者自我表白的回击:“你反动!”“你污蔑!”“你造谣!”“要不就是拳打脚踢皮鞭啊,还有谁敢接触到所谓案情的内容呢!”“你污蔑中央首长!”“你诋毁无产阶级司令部!”“你罪大恶极!”“你死有余辜!”这么一来一往的对骂,一句一句地紧接,相互交织,弥漫在审讯室的空气中。书记员记了许久,下来只能哭丧着脸向“领导”诉苦说:“这,这这这,怎么能作为材料呢!”“领导”只能难堪地说:“压下吧,可不能毁掉,查起来要负责责任的!”

(摘自《从“童怀周”到审江青》汪文风/著)

(作者为当年审理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)

## 残雪:把生活变成艺术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6个月之后,我们用铝板做了个小招牌吊在窗户下面(当时住三楼),开始正式承接服装了。我记得第二个月就赚了60多元钱,合丈夫两个月工资,此后当然越做越发。丈夫的裁剪技术与众不同,很受欢迎,我则比较擅长于为顾客设计合体的式样。最为繁荣的期间,我们在家带了4个徒弟一起干。我们在门上安了那种最原始的电铃,顾客一按,它就发出如鸭公一样的怪叫。在我听来,这响声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音乐,它代表了自由、希望和心境的平和。

我的处女作《黄泥街》的创作,就是在这样喧闹的环境中开始的。那大约是承接服装不到一年之际,我的自信心空前的高涨,前途闪闪发光。白天忙忙碌碌,人来人往,一边脑袋里塞满了衣服尺寸,我就用另一边脑袋创作。我见缝插针地将草稿写在一个旧笔记本子上,到了夜间再一一誊清。我在写作时并不十分惧怕外界的干扰,我的思维常常可以在两界之间自由地穿梭,刚刚为顾客量完尺寸,设计好式样,马上又可以回到桌边去写。

1985年,在作家朋友们的帮助下,我的作品终于得以发表!我没有料到会如此顺利。到了1986年,刊物上面就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对残雪作品的评价,向我约稿的人多起来了。形势对作品的数量有了要求。我自己的内心也很迫切,我觉得我要写,我一定要写,我已经憋了这么多年了,要赶快写啊!谁知道形势会怎么样变呢?

1986年至1987年,我开始“退居二线”,将缝纫工作全盘交给丈夫去处理,自己只煮煮饭,管管儿子。

1986年至1988年,我发表了大量的作品,在文坛上造成了影响。至此写作已成了我生命的目的。

(残雪,湖南先锋派文学代表人物,代表作有《山上的小屋》《苍老的浮云》等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

(摘自《写书记》残雪/文)